

访《无声的革命》作者：保持大学生源多样性

来源：2012年4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95期

作者：本报记者 郑清

浏览： 46 次 [我要评论](#) 字号:大中小

【核心提示】精英教育的生源多样性和开放度问题不仅受教育政策制定者关注，也是大多数社会民众的关注焦点，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热点议题，需要学界更努力、更精确地进行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刊发了梁晨、李中清等合著论文《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引起了国内多家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一个多月里，包括中央主流媒体在内的多家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先后发表了超过120个形式各异的报道，有近千个网站转发了这些报道，并讨论此项研究及其反映的社会问题。近日，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再次采访了作者之一李中清。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与梁晨等人合作的《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刊发以来，引起学界和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李中清：坦率地说，《无声的革命》这样一篇以数据统计和分析为主的枯燥学术论文会引起如此关注，是出乎意料的。文章发表以来，国内多家新闻媒体和部分学者进行了相关讨论。当然，这种现象并非表明这项研究有多么出色，而是表明此类主题特别重要。精英教育的生源多样性和开放度问题不仅受教育政策制定者关注，也是大多数社会民众的关注焦点，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热点议题，需要学界更努力、更精确地进行研究。

同时，社会各界对我们长期研究计划得出的初步成果如此关切也充分说明，当初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校方思量再三，最终允许我们建立两校共计超过15万人的本科生学籍卡数据库并进行运算和分析是非常正确的决定，这不仅为解决重要的学术问题提供了宝贵研究材料，也适应了社会发展和人民大众的需要。应该说，学籍卡这一研究项目是在北京大学、苏州大学与我领导的研究小组协同合作下完成的，两所大学给予了至关重要的帮助。我们的研究组也是一个集体，康文林教授、阮丹青教

授和杨善华教授一直与我通力合作，张浩、李兰和梁晨等年轻的研究人员也非常努力，此外我们还有数十位研究助理和编码工作人员协助研究。从我们初步讨论到正式将数据输入电脑，再到分析得出初步结果，前后花费了近十年时间，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当然，目前我们的研究结果应该说还是初步的，两校的数据库还有很多进一步发掘的空间，有条件时我们还会继续深入研究和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根据你们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里，北大的干部子女比例从11%增加到了近40%，苏大的干部子女比例也从5%增加到了30%，您是如何理解和认识这种现象的？

李中清：长期来看，两所大学的干部子女比例确实有一定的增长，但我认为，这种增长最主要的还是受到中国干部人数增长的影响。1949年以后，中国这个传统农业大国的工业化进程几经波折但一直得以持续。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开始腾飞，商业和服务经济快速发展，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职业结构。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编著的《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中的数据统计，在1949年后的50年里，中国全国的干部数量从500万增加到了5000万，是原来的10倍。与此同时，全国农民的职业人口比例却下降了近一半，从90%下降到了48.3%。

这些增加的“干部”大多来自各类公私营企业而不是行政管理部门。实际上，由于得到苏州大学的允许，我们根据苏大干部家长的单位与职务信息，将其分为党政干部、事业单位干部和企业干部等不同类型，结果发现，党政干部比例从1973年的77%持续下降到2001年的40%，企业干部比例则从1973年的4%持续增加到2001年的43%。

《中国社会科学报》：你们的研究结论与国内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是否存在一些差异？

李中清：实际上，我们的大多数研究结论与此前其他学者的研究发现是相互印证的。比如我们的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北大来自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家庭的子女有所增加，而农民子女比例有所下降；而刘云杉、李文胜等人的研究也有同样的发现。又比如我们的研究认为，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高考制度对工农家庭子女可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这与罗立祝在对高考招生、保送招生、自主招生、高考加分等不同招生制度分析后，认为高考招生更有利于农村家庭子女的结论也是基本吻合的。

当然，我们的研究也确实有不同于其他学者的发现，其中最主要的是，我们发现在北大，农民家庭子女比例的下降与工人家庭子女比例的上升几乎是同步的，而改革开放以来，北大工农家庭子女总体的比例却

基本是稳定的。同时，我们还发现，在北大相对于农民子女的下降，家庭居住地是农村的学生比例则要稳定得多，而家庭居住地是城市的学生比例增加并不特别明显。这些现象表明，农民子女变动是具有社会经济内涵的，仅仅以此一个现象来判断精英教育生源多样性或开放性的转变程度显得有些片面。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您能否继续为我们分析一下，你们的研究结论中干部子女的增长对中国教育的社会流动性意味着什么？

李中清：应该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两所大学尤其是北大数据的分析才能有更明确的答案。一方面，北大的工农与非工农家庭子女之比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里一直比较稳定，而苏大还有所增长；另一方面，在工农与非工农内部，不同职业家庭子女的比例却发生了更明显的转变。我们认为，大部分转变表明的是中国社会职业结构的整体性转变，但同时，只有通过进一步细分学生的家庭地址和工人、干部等家长的工作单位，才能更准确地定位他们的社会背景。由于单位信息相对复杂得多，数量也特别大，无法采用电脑程序进行分类，几乎都需要手工进行一一识别和分类，工作量非常大。目前，我们研究组正在增加人手，准备在得到两所大学允许后就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当下中国社会在很多方面都有非常迅速的改变，许多社会职业分类也变得越来越混杂，难以清楚界定，这都需要更深入和更细致的研究。此外，我们还准备将学籍卡中的家庭出身与职业进行连接，将家庭地址与户籍相连接，通过比较分析更准确地描述50年里学生来源的社会变迁。

不过，苏州大学的材料表明，改革开放以后，尽管该校的干部子女比例也呈现增长态势，但苏大的农村生源也有明显的增长，同时来自苏北相对落后地区的学生比例也在提高，这些都说明至少到21世纪初，在一些省级精英大学，干部子女的增加并没有造成精英教育在社会流动方面的下降。可以肯定的是，即便目前中国精英教育对贫困子弟的开放程度相对于过去可能有所下降，但考虑到中国贫富不均状况和两所大学在21世纪初仍能保持生源多样化的事实，这依然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成就。

我个人认为，不公平是全世界各种社会的普遍现象，精英教育也不例外。可是至少到21世纪初，中国精英高等教育机会比1949年以前的中国以及目前许多其他国家要开放得多，这也是事实。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现象呈现出两面性，既有干部子女增加，也有工人子女同时增加的现象；既存在教育资源的城乡、单位间分布不平等，也存在着同一学校中，学生家长职务高低不等、职业差异多样的特点。但如果我们总是太过于强调某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既不客观，也不利于我们总结自身经验，更好地处理社会问题和进行国家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报》：通过这十多年的研究，您对当下中国如何增强精英教育的开放性和生源多样化有什么建议或主张？

李中清：我们认为两所大学表现出的生源多样性是中国坚持客观考试制度的直接结果，这种客观考试的选拔方式不仅存在于大学的招生中，也存在于中学特别是重点中学的招生中。任何弱化或修改客观考试制度的做法都可能加强社会不同精英群体对精英教育权的垄断，并进而剥夺社会中下层子弟通过教育、个人才能和勤奋学习以获取成功的机会。

此外，通过研究我们还发现，某一地区的教育成绩与经济发展程度并不完全相关，一些经济并非最发达的地区输送进精英大学的学生数完全可以比发达地区还要多。例如江苏的南通，由于当地“县中”发达，教师要求严格，学生学习认真，当地学生的考试能力甚至超过苏南经济发达的常州地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南通还创造了连续10年高考录取率在江苏排名第一的奇迹，民间更有“全国高考看江苏，江苏高考看南通”的说法。南通的成功应该是有多方面因素的，如当地的办学条件、社会风气和政府投入等，但不管怎样，这个经验提示我们，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除了中央政府的统筹规划外，地方政府也应有长远眼光，如通过加强对本地基础教育的投入以及重点发展几所中学，是可以提升本地学生竞争力的，这对推进精英教育生源多样化也是有利的。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分享到:QQ 空间新浪微博腾讯微博网
易微博鲜果网豆瓣人人网